

■ 妇女研究

翻身与翻心: 土改中女性的双重体验

——以沂蒙地区为例

王克霞

(中国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80)

[摘要] 土地改革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的一场最广泛、最深刻、最成功的社会动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政治信仰、准则、认知价值和情感等灌输给了广大妇女,同时沂蒙妇女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并完成土改,通过集体活动获取另类体验,实现了其社会价值。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土改不仅是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翻身”,更是心灵上的一次呐喊——翻心。土改中,沂蒙妇女走出了家庭和原有的生活圈,参与到了社会革命的宏大历史运动中,在集体主义的精神世界里实践着自身的解放。

[关键词] 土改; 沂蒙妇女; 翻身; 翻心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12)04-0107-04 [收稿日期] 2012-02-11

[作者简介] 王克霞,女,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妇女史。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政治与学术之间: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的农村问题研究”(批准文号: 10YJCZH022); 中国石油大学自主创新科研计划项目“革命与变迁: 山东革命根据地妇女研究”(批准文号: 12CX04011B)。

土地改革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的一场最广泛、最深刻、最成功的社会动员。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土改不仅是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翻身”,更是心灵上的一次呐喊——翻心。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政治信仰、准则、认知价值和情感等灌输给了广大妇女; 占中国妇女大多数的农村妇女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并完成土改,并通过集体活动获取另类体验,实现了其社会价值。学术界对土改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以女性主义角度来研究土改的成果并不多见。文章在查阅相关档案的基础上,以沂蒙根据地妇女土改运动为例,探究政治运动中女性的独特体验,以期对今天妇女政治工作有所借鉴。

一、参与: 被动到主动

长期以来的社会性别分工使农村妇女自己自觉地将政治排除在生活之外,使之表现为对各种政治活动的冷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对灾难深重的广大妇女给予了深深的关怀,在其政策引导和宣传之下,沂蒙根据地妇女逐渐从被动转变为积极主动参与土改。

中国共产党一直很重视土改运动中的妇女工

作,1947年12月,中共中央专门就发动妇女参加土改并广泛收集发动经验发出指示,指出土改中领导“应主动及时地加强发动妇女参加,发动得愈多愈普遍愈好……使受压迫的妇女大翻身,打破数千年来在观念上及社会制度和习惯上的封建束缚”^[1]。但土改之初,中国共产党期待妇女为自身的解放,全社会的解放无条件的奉献,甚至以为只要他们制定了政策和法律,广大妇女就会积极跟进和参与,出于这种假设,早期对妇女的动员是非常政治性的。由于这种政策不顾妇女的现实生活,忽略了妇女自身的利益和需求。因此沂蒙地区的土改运动的初期,妇女工作遇到了一些困难。问题主要是“对妇女发动太差,个别地区放松了这一工作的领导,广大妇女没有能得到发动,大部村庄妇女不参加运动,即使参加只限于几个青年妇女,而这部分青年妇女又很少是政治上的觉悟,大部是从兴趣观点出发,即受痛苦最严重的壮年妇女都未能发动起来,不能达到发动群众90%的目的,大部分地区汇报发动群众到60%—70%,原来没有把妇女算在内,这样折去一半,就只剩下35%了”,“雇贫农、村干、中农三者分

离雇贫农小组在群运中裸体跳舞,没有把广大中农和妇女发动起来,这样是不能控制封建势力的。……特别是对妇女的发动尤差,简直用在一边不问。下位区甄家疃仅有八个妇女参加。东里区有的村只是三五个妇女干部参加,占人口一半的广大妇女没有发动起来。有的村由于妇女得不到教育不懂得为什么要复查,存在着变天思想,男的参加斗争,女的在扯后腿”^[2]。

针对当时各个解放区普遍存在的妇女政治工作发动难的问题,中共中央在思想上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第一步,教育土改干部明确动员妇女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二步,对妇女进行妇女解放的宣传,帮助其解除思想顾虑,提高阶级觉悟,使她们主动参加到土改中来。第三步,说服教育婆婆、丈夫,使他们不再阻碍妇女而是支持妇女参加土改。

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沂蒙地区的妇女工作有了显著改善,土改运动中开始活跃起妇女的身影。首先成立了妇女代表委员会,直接成为土改的骨干力量。根据沂水县13个区94个乡的统计,发展农协会员3644人,妇女会员2861人。在沂水县龙口的斗争会上,三百多人,妇女就占了二百多,选主席团的时候,妇女又占了三分之二;斗争中大部分是妇女发言。^[3]而莒南县利用妇女胆大心细,感情丰富、泼辣勇猛的特点,把佃户老婆专门组织成“佃户妇女小组”。根据斗争的需要,把善于鼓动群众发言、提意见的组成“战斗班”,能说会道、专门顶嘴斗理的组成“铁嘴班”,斗争会前、会上负责侦查对方情况的“侦查班”。^[4]土改复查中,莒南莒宾区还专门组织了妇女法庭,斗争恶霸地主徐老九,实行妇女当家,领导开展群众性的大复仇。^[5]

其次,利用妇女做政治动员工作,进一步扩大土改运动。从社会学角度看,妇女可谓是一个主要以性别为特征而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她们不仅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活动,而且还直接施加影响于家庭成员。沂蒙根据地的土改运动中,妇女就起到了重要的动员作用。如莒南县土改运动中,就成功利用“识字班”进行了土改动员。“由于她们(识字班)活跃、积极,于是组织了宣传小组,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动员,算细账讲谁养谁的道理给佃户听。一些佃户家老大娘经过动员后说‘这是好事呀,我一定减租。’她们挨门挨户去动员,在街上碰到人就说。在妇救会里,还把佃户妇女编成小组。十九号减租

大会上妇女到二百多人,并争先发言,几个大娘一边流泪一边诉说自己的痛苦,她们都是以后表现很好的妇救会员。”^[6]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倡的妇女解放时不彻底不成功的,那么土改运动对妇女的解放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值得肯定的。事实也证明,以封建剥削制度为革命对象,以消灭地主阶级为斗争目标的土地改革运动,确实带来了农村妇女前所未有的解放,“一向围着炕头锅灶转的农村妇女,也加入了土地改革的大军之中。……许多连自己名字也没有的妇女,不但敢同地主斗争了,而且还成为运动的骨干力量”。^[7]

二、实践:性别与差异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对于中国的妇女解放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使中国的妇女解放被纳入阶级解放的范畴中,这使得土改中妇女的身份首先是一个受压迫阶级,然后才是社会性别中的被压迫者。但是她毕竟还是女性,土改中妇女的表现就呈现出革命的大趋向以及社会性别的点点痕迹。

(一) 斗争方式:诉苦主力军

沂蒙地区的偏僻落后最初给发动妇女参加革命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一旦妇女发动起来,她们献身于革命运动将是全心全意的。

在封建礼教占绝对统治的乡村社会,发动处在父权制性别规范重重包围之下的妇女,阻力是非常大的。首先是家庭阻力。韩丁曾描写张庄妇女参加土改的情况。几个主要村干部的妻子最先组织起妇女会,通过“诉苦忆苦”,发现自己所受苦难比男人还多。但丈夫和婆婆强烈不满,指责她们伤风败俗。再就是社会阻力。在沂北沭河区,在刚布置妇女土改普查的时候,部分区干部思想打不通,村干部更是打不通,如村干部吴培庆同志说“要叫妇女作复查工作,杀了她也完不成。”^[8]这样的人在当时不在少数,从而导致了部分地区妇女工作的被动。

但千百年来女性“失语”现象,一旦放开闸门,就势不可挡。妇女易动感情,是天生的诉说者,这一生理优势使得妇女成为这一时期各种“诉苦”运动的主力军。在山东莱芜的铁车乡石湾子村的侯学英这样说发动妇女斗地主“只要是斗地主,一和她(妇女)说就来,只要说饭后开斗争会,饭后她(妇女)就来,都这样。这个村的妇女都很好发动,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好领导。”同时,她也强调“当时

斗地主,主要是让他献东西。”^[9]沂中县王家坪诉苦时,“30个妇女即有23个流泪的”,经过诉苦,群众“觉悟较前大为提高,特别对妇女的发动最好。妇女在诉苦中诉的最具体,诉的最多,经过诉苦的村子妇女大都发动起来了”,于是认定“诉苦是发动妇女的最好办法。”^[10]

(二) 斗争内容 “道德至上”原则

将“性堕落”等同于“政治堕落”,参与土改的妇女尤为关注不正当两性关系。土改中被妇女批斗的男性多为乱搞男女关系者,而土改中被批斗的女性也多因为作风不好。

如莒南县洙边环河崖村的民兵队长刘之四讲了邻村村主任因男女关系不检点,遭人嫌而被妇女斗死的往事。“东边胡家岭那个村主任挨斗,叫一群妇女用剪刀插死了。他不过就是男女关系多一点。……妇女对掌管会场的说,俺不打他,俺带他去北边提提意见。这不,弄到北边离开会场,一阵子弄死了。”^[11]

道德败坏的女性,表现在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以及邻里关系、家庭关系处理不善的女性。这类女性即使她的阶级成分为贫农,也会受到批判。如莒南县刘家碓山某农会干部在批斗会上“指明要斗15户破鞋。(破鞋:作风不好的女人——笔者注)吓得刘纪叶家喝卤水自尽了。这15家都吓得准备好了卤水自尽。”^[12]如莒南县壮岗区泥塘沟村徐秀荣妻,贫农,破鞋,为借磨被斗,说教育破鞋,由识字班带领到新店子游街,引起群众的不满,造成村里破鞋嫌疑的恐惧和反对村干部。^[13]中共鲁南区委《鲁南八个月群众运动总结及今后工作》(1945年5月15日)在反省群众运动时曾指出妇女运动中的“关于斗争破鞋,基本上是不适当,在个别的村庄也形成了一个运动(尤其是集镇),如温河高桥。我们的同志没有了解到这些是中国社会所造成的恶果,不是斗争会所能解决的问题。因此,今后对斗争破鞋,应严格地停止。”^[14]可见当时因为作风不好而受到批斗的女性数量不少。

还有就是为人不好的。在沂南县某村的反奸诉苦、斗恶霸的热潮中,妇女们趁机斗了恶女人、“三母狗”和一个汉奸老婆。“三母狗”压迫儿媳,欺负邻里,斗争会开了三天,由妇女们的会扩大到全村民的会,她们的斗争方式很有特点,数落那人的罪状十分形象,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但是女人开斗争会会感情用事。“斗争汉奸老婆,开始斗的很精彩,后来有人

加进了私人矛盾,抓挠起来,她们怕出事,连忙宣布散会。”“下次会也没再开,她们知道坏女人,坏归坏,若斗出了人命,违犯了政策,那可也是不得了的呀!”^[15]

(三) 斗争结果:被动的政治分化

有的学者曾提出“同一社会性别内的差异,往往比不同社会性别之间的平均差异大。”^[16]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以往政治意识淡漠的广大农村妇女也卷入不同阵营,但不同于男性的是,这种政治分化大多是被动的。

对于妇女来说,划分阶级的过程是被动的。婚姻决定着她的阶级成分,而与她娘家,及其本身是否参与剥削毫无关系。如沂蒙根据地郯城县的徐王氏,根据其自述,我们发现她也是受压迫的妇女,是很不幸的。“我8岁给重坊街孙永连当童养媳,19岁,与其结婚,因丈夫给地主家当护兵,不干正事,敲诈民财,又娶一房小老婆。1937年他就不要我了,我领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回娘家,没有办法,和地主徐贞阵(66岁)结婚。1941年徐死,33岁(1942)和贫农徐敏杰私自一起合伙生活,下半年才住到一起,徐死后(1950年徐死)务农至今,50年被划为地主。”再如山东省郯城县红花区的孟张氏,“当时的主要生活来源是种地主的地,收的粮食和地主半分,年年够吃,也没有什么剩余。”连当时的土改干部都说,其“论经济方面不够地主成份”,但是把她划为地主是因为“其男人孟广银很坏,是地主家的狗腿子,做了不少坏事,就给他划个坏地主”^[17]。

可见,划分地主要是看夫家,全然不顾其在夫家的地位与遭遇。其实在地主家,女性也往往处在底层。而一旦被划为“落后”成分的女性,其在生活各方面就会受到相应的一些管制。如沂中县(今沂南县南部)“峙阳区大张庄妇女将脏衣服令地主妇女洗,洗不干净不行。鲁家庄青年将衣服让地主给缝,缝不好即打或斗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将地主妇女的头发剪了,青年妇女剪光,老年妇女剪一半,奇难看”^[18]。

三、体验:翻身与翻心

土地改革的进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常规性的生活,也改变了农民生活世界中的逻辑。而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土改不仅是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翻身”,更是心灵上的一次呐喊——翻心。土改中,沂蒙妇女走出了家庭和原有的生活圈,参与到了社会革命的宏大历史运动中,在集体主义的精神世

界里实践着自身的解放。

(一) 萌生群体意识,体认自身价值

社会学大师涂尔干(E. Durkheim)有个理论:“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指的是在政治的集体的仪式化的活动中个体所能感受到的精神兴奋与共鸣。土改运动中,沂蒙妇女就体验到了这种集体的快乐。

土改中的动员手段之一就是“诉苦会”。其活动形式是派一个干部(政治工作人员)将一些妇女召集在一起,并鼓励她们诉说自己的身世。干部开导她们从此可以不受男子的奴役,她们有权和男子平起平坐,有权吃好的东西,而且不再挨丈夫和婆家人的拳打脚踢。一开始妇女们不大情愿倾吐心中的苦水,后来慢慢地说开了。通过这种活动,妇女们很快就认识到她们个人的辛酸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她们所处的社会现状所决定的,于是她们从个人的恩怨中解脱出来,意识到要用集体的力量推翻这吃人的制度。“诉苦会”不但推动了土改的顺利进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妇女们逐渐萌生了群体意识,体认到自身价值。妇女们通过参加政治、经济活动,取得了做人的资格。她们和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平起平坐,畅所欲言,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见解,谁好,谁坏,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按沂蒙妇女自己的话说“我活了大半辈子,窝在心中的不平事,今天才敢说出来!”^[19]长久受压抑的沂蒙妇女第一次获得了解放,有了做人的权利。

(二) 积极拥军参战,认同共产党

妇女作为家庭的重要成员,她们对革命战争的认识和态度对于家庭中的男性是否参加革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土改之后,广大沂蒙妇女分得了土地,更加认同共产党,积极拥军参战,支持解放战争。

首先是妇女自身承担起支援部队的后勤工作。

沂蒙根据地局部大反攻开始后,战役规模不断扩大,八路军主力迅速壮大,大批青壮年参军支前上了前线,支援部队的后勤工作基本上落在了妇女的肩上。有的村庄成了“女儿国”。在“女儿国”里,从村长、党支部书记到民兵队长、农救会长、青救会长全都由妇女担任。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下,上至六七十岁的老大娘,下至八九岁的小姑娘全部组织了起来。在物质供应,从粮食到被服、鞋子都是沂蒙妇女承担。据《鲁中大众》报道,“沂中县荆山区共26个村,年初已有下常庄村的郝得秀、东虎崖村

的王文贞、黄落坊的刘富荣、王廷荣、施家官庄村的刘正英等七个妇女当了村长。她们当了家以后,一天一夜完成熟给养5万斤,献干菜700多斤,到区政府送粮的路上,都是妇女们一晃一晃地推着小车或挑着担子,特别下常庄和东虎崖妇女,干的更起劲”^[20]。除去一些物质供应,妇女还在精神上鼓舞、激励着战士,沂蒙妇女们还自编了慰问人民军队歌谣,如“深山里,梨花飘,战场上捷报,姐妹们来慰劳,问一声同志们辛苦了,熬过了今日艰和苦,建立了新中国乐陶陶”^[21]。

其次,沂蒙妇女鼓励男性参军。

据1947年3月8日的《大众日报》报导,新泰、沂中、沂北等三个县,就有25位老祖母送孙子、213位母亲送儿子、157位妻子送丈夫、30余位姑娘送未婚夫、40余位姑娘送兄弟、父亲参军。青年妇女、“识字班”扭着秧歌把自己的亲人送到部队,并一再嘱咐“好好干,打垮老蒋再团圆。”参军人员一致表示“不打垮反动派誓不返乡!”由于强有力的动员工作,半年内,沂蒙山区就有5万青年参军。^[22]还出现了很多的拥参工作模范,如沂水县就有把四儿一女送前线的拥军模范彭大娘。

土改中,沂蒙妇女们在集体中实践着个性的解放。虽然有些人善意地争辩说这些妇女其实对自身解放认识不足,她们仅是从政治宣传中得知这一概念,而其自我意识只是被“误认”的。他们甚至引入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这样的理论来解读这一现象。无论沂蒙妇女们能否理解妇女解放的概念,她们已经从实践中先验地获得了实质上的好处,这不仅包括物质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满足,这种满足又表现为集体主义精神的高昂,正如美国学者杰克·贝尔登所说“中国妇女的痛苦、烦恼和绝望已被革命之火烧成一种快乐、自豪和希望的新感情,这是对全世界都具有巨大意义的一种现象”^[23]。

参考文献

- [1]邓颖超.土地改革与妇女工作的新任务[A].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中国解放区妇女运动文献[C].北京:新华书店,1949:28.
- [2]沂中县委.通报(1947年)[A].中共沂中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沂水县党史资料汇编(第四辑)[C].莒县印刷厂,1987:199.
- [3]李臻.说妇女不能复查是咱思想上有毛病[N].鲁中大众,1947-6-16.
- [4]莒南县委.大店查减斗争总结(1944年10月)[D].临沂市档案馆馆藏,市委永久卷:3-1-6.

(下转第115页)

密不可分。就第二个层次而论,康格夫人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有了解之同情,有作为基督徒的宽容和友善,也有文明者自身道德要求的对中国的尊重,似乎能够超越同时代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尽管如此,她仍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许多时候仍然不自觉地站在入侵者和拯救者的立场来看待中国,从而呈现一种隐蔽的西方中心主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康格夫人怀着复杂的情感来描述中国妇女形象时,形象学理论的运用呈现一种多元的、复数的特质。人类的情感的复杂性决定了不能用单一的灰色的理论去生搬硬套。“当代形象学受到符号学、结构主义的影响,把一切都视为‘程序化’、‘编码化’的东西,处心积虑寻找各种解码的规律。但若因此而忽视了文学形象所包含的情感因素,忽视了每个作家的独创性,那就是忽视了一个形象最动人的部分,扼杀了其生命。这就有使形象学研究陷入到教条和僵化境地中去的危险。”

有学者提出,破除形象学研究模式化的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回归文本,而回归文本就要作者这一主体的个人性给予充分的考虑。康格夫人的《北京信札》文本内涵的复杂性与作者情感的丰富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同时也提醒我们在运用形象学理论来分析某一具体的文本时,既不能仅仅关注被注视形象与其实际状态的关系,以及被注视者对注视者所描写的内容和边界的制约作用,也

不能仅仅关注注视者的社会文化背景、情感个性等,从而使得被注视者处于一种严重的失语境地,而应该给予两者各自应有的地位和声音,特别是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 [1]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A].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2]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 [3]M·G·马森.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4]E·A·罗斯.E·A·罗斯眼中的中国,[M].重庆:重庆出版社.
- [5]萨拉·康格.北京信札,沈春蕾等译[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 [6]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A].中国人三书[C].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
- [7]狄泽林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发展[J].中国比较文学,1993(1).
- [8]沈春蕾.译者序[A].北京信札[C].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 [9]钱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在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与殖民话语[A].(美)赛义德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10]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A].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11]孟华.形象学研究要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J].中国比较文学,2000(4).
- [12]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A].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13]尹德翔.关于形象学实践的几个问题[J].文艺评论,2005(6).

(责任编辑:郭洪)

(上接第110页)

- [5]贾佩.五百妇女做大堂——公审恶霸地主徐老九(1947年9月17日)[D].莒南县档案馆馆藏,县委永久卷:1-1-38.
- [6]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的减租减息[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219.
- [7]罗汉平.土地改革运动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110.
- [8]李臻.说妇女不能复查是咱思想上有毛病[N].鲁中大众,1947-6-16.
- [9]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M].北京:三联书店,2003:497.
- [10]沂中目前工作情况(1947年12月5日)[D].临沂档案馆馆藏,市委永久卷:1-25-8.
- [11]张学强.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52.
- [12]刘庆垫、李高斗.刘家碓山重新发动雇贫农进行清算斗争[D].莒南县档案馆馆藏,县委永久卷:1-1-38.
- [13]杜岗区几个村的材料[D].莒南县档案馆馆藏,县委永久卷:1-1-37.
- [14]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的减租减息[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 1994:342.
- [15]苗得雨.沂水情[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69.
- [16]周颜玲.有关妇女、性和社会性别的话语[A].王政.社会性别研究选[C].北京:三联书店,1998:383.
- [17]四清工作团办公室.重坊、房庄、马头三个区改变成份呈批表、红花、城关、褚墩、泉源、港上、墨河、白河、李庄八个区改变成份呈批表[D].郯城县档案馆馆藏,县委永久卷:9-1-14.
- [18]莒南县委.关于复查中几个问题的总结(1947年11月14日)[D].莒南档案馆馆藏,县委永久卷:1-1-39.
- [19]张侠.鲁中南妇女运动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32.
- [20]管庆本、冯美林.咱鲁中区很多妇女当了家[N].鲁中大众,1947-2-28.
- [21]苗得雨.沂水情[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195.
- [22]李佩芝、王冠卿.沂蒙革命斗争史略[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286.
- [23](美)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中国震撼世界[M].邱应觉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393.

(责任编辑:郭洪)